

胜利之路

(修订第三版)

〔苏〕A·X·巴巴贾尼扬

刘名于等译

ДОРОГИ ПОБЕДЫ
(ТРЕТЬЕ ИЗДАНИЕ, ИСПРАВЛЕННОЕ И ДОПОЛНЕНИЕ)
А. Х. БАБАДЖАНИЯ
МОСКВА—1981

胜 利 之 路
(修订第三版)
〔苏〕А·Х·巴巴贾尼扬著
刘 名 于 等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1印张·230,000字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5185·78 定价:1.80元

目 录

第一章	战争前夜.....	1
第二章	战争.....	59
第三章	“注意，坦克！”	107
第四章	解放乌克兰.....	172
第五章	西进波兰.....	227
第六章	胜利前夕.....	259
第七章	向东，前进！	295
第八章	胜利.....	319

第一章

战争前夜

我从来没有想到，离开列宁格勒会是这样伤心。火车载着我向南奔驰。越向南走，离我的家乡越近，但离我深深喜爱的列宁格勒却越来越远了，离那海军部大厦的尖顶，离那拱桥，离那洗濯场和喷水池越来越远了。

我奉命去指挥一个步兵团。这是我经过长期申请，多次打报告才争取到的。上级不想让我脱离司令部工作，因此我迟迟不能下部队。后来，我的申请终于见了效，我先是在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团当副团长，这回是任命我去当团长的。那时正是1940年秋天，我坐了火车去上任。

我的家眷——妻子、儿子和一个小女儿，都留在了列宁格勒。他们该怎样过下去呢？……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萦回，久久不能消逝。要打仗吗？可德国，法西斯德国这个未来战争中最危险的敌人，跟我们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刚刚一年。乍看起来，对它担心还没有什么根据。

火车载着我继续向南驰去，把俄罗斯、乌克兰的大地都甩在后边。突然，高加索山脉的山前地带光彩夺目的景象透过打开的车窗映入我的眼帘，我完全被这五光十色的景物迷住了，暂时中断了回忆和思考。

车到站了。我从容地穿过整个市区，来到师部的驻地。欢腾的捷列克河，掀着一片片浪花，滚滚流去；格鲁吉亚军

用公路盘旋在丛山暗谷之间。

师部设在一幢不大的两层楼房里。在列宁格勒伊兹马依洛夫大街宽敞的营房里住过以后，看到这幢小楼，似乎它比原来更小了。狭窄的走廊里，许多穿骑兵服的军官走来走去，皮靴上的马刺碰得叮咣响。我甚至一时起了疑心：我是否走错了地方，不然怎么这样多骑兵呢，难道这不是步兵师吗？

师长也带着骑兵的领章。他瞅我这惊奇的样子，直截了当地说：

“少校，奇怪吗？我明白，你是在大城市呆惯了。我们这儿，什么车也顶不了马。这里可不是你们那涅瓦大街，没什么大路，坐汽车可不是通行无阻。马嘛，还是顶用的。内战时候，我们就是骑马打仗的，夺得了苏维埃政权。还是要骑马呀！”

“上校同志，”我表白地说，“我也喜欢马，我是高加索人。”

“那还有什么说的？”

“德国人用坦克打败了几个国家……在当前的战争中……”

“什么？！”他那低沉的声音如雷鸣，打断我的话说，“也许你是知道的，我们跟德国人不是签了条约吗？！”

我相信他说的话，这我也是知道的。

※ ※ ※

这事情倒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人们对于跟法西斯德国订立的条约是很信不过的。都认为跟德国的这场战争迟早要发生。法西斯军队在欧洲取得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德军将领们的头脑，给相当多的德国居民造成了极其有害的影响。戈培尔

的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声嘶力竭地鼓吹什么“元首的天才”，他的“全盛政绩”。德军最高统帅部完全由希特勒一手垄断。到了战后，我才看到当时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哈尔德①写的《军事日记》。他写道：

“要解决欧洲的霸权问题，关键是斗倒俄国。因此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在政局需要的时候打败俄国。”②

1940年秋，希特勒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的军事、经济基地。德国在战败法国，进军英吉利海峡，占领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以后，使英国同欧洲大陆隔绝，西线的后方不会遭到英国的有力打击，只要用不怎么大的兵力就可以守住西海岸。而在占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希腊以后，德国的东南翼也得到了保障，使敌人的登陆兵不能大批登陆。

换言之，到了1940年底和1941年初，希特勒德国已经为腾出大量兵力集中到罗马尼亚、波兰、芬兰和东普鲁士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把这些兵力调到这些地区需要的时间不超过5~6个月。如果考虑到西欧的铁路和公路网比较发达，可以预料这一调兵时间可以轻而易举地缩短到3~4个月。接近我国边境在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芬兰境内建立起来的机场网可以容纳数千架各种型式和用途的飞机。

到战争开始时，德国已在我边境集结了（包括仆从国家的军队）550万人，近5000架作战飞机，约4300辆坦克和强击炮（即自行火炮——译注），还有大量其它的技术兵器。

① 弗朗兹·哈尔德，法西斯德国陆军上将，1938年9月至1942年9月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译注。

② 弗·哈尔德：《军事日记》，莫斯科，1969年俄文版第2卷第298页。

这样多的军队和装备需要有大量的列车来输送。当然，对于这些，我们的侦察并不是没有察觉的。

那些具有偏见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学家，硬说苏联领导人盲目依赖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相信了法西斯头目在承担义务方面的“诚意”和“循规蹈矩”，这纯属是恶意诽谤。党中央和苏联政府正确地认识到，这个条约可以使我们赢得巩固国防的时间，可以妨碍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反苏统一战线之建立。

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战前年代我们国家很快就成了强大的工农业大国。我们的军人高兴地看到，我们已经开始采取一整套巩固国防的措施，我们红军的陆海军都在更新技术装备。

我们已经建全了不断充实军队的干部体制，特别重视增加部队和兵团的数量，并建立大型的机械化兵团——机械化军。1940年建立起9个机械化军，1941年2、3月间又建立起20个机械化军。但遗憾的是，在战争爆发时这一组建工作还没有完成，因为坦克和其它战斗车辆以及受过训的指挥干部都数量不足。

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很同意朱可夫元帅的看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1939年到1941年夏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整体而言是全面改编军队，只两三年的时间苏维埃人民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①

苏联军界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的问题。比如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用于理论问题的讲授和课堂讨论的时间几乎增加了一倍。我们这些军人带着极大的兴趣来讨

^①Г·К·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70年俄文版第238页。

论我们能够看到的新书，而对于未来战争的性质以及各兵种、特别是新出现的兵种在战争中的作用，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而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我国内战结束以后，上述问题也是各国军事理论家集中精力研究的问题。他们认为，战场上已经出现“打不垮的”坦克，在空中也已开辟了战场；不需要大量的军队参加，技术装备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似乎是出现了可以用最简便的办法解决政治和阶级问题的难得的可能性。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和军界头目就是这样想的。“小型军队”、“空中战争”等等的理论也相继问世。

推崇“小型军队”理论的英国理论家J·富勒和利德尔·哈特，过高地估计了坦克和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对于英国取得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

在图书馆里，人们争相阅读富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坦克》这本书，有更多的人阅读他的另外的一本书——《战争的改革》。他预见到，未来的战争将是拥有大量技术兵器的、规模不大的职业雇佣军队的战争。甚至认为，兵役制也只有对于那些要执行占领军职责的军队才是必要的。

在意大利将军朱利奥·杜黑^①写的《制空权》一书中也暴露了同样的思想：以大群的飞机——上千架轰炸机（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很可观的数目），每天去轰炸五、六十个工业中心，把敌人的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以此迫敌投降。

^①朱利奥·杜黑，意大利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少将。1910年提出了空军在未来战争中起主导作用的见解，成为“空军制胜”论的创始人。——译注。

“空中战争”理论的“鼻祖”起初也曾用他那一系列的论证迷惑过一些人。应当感谢我们的理论专家，他们迅速把事情恢复了本来的面貌，并且证明，杜黑所提出的论据，实质上很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的论据如出一辙。不管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怎样伪装，他们的观点的真遂还都是一样的：借此吓唬手中拿着武器的千百万群众。因为群众可能会调转枪口去反对发给他们武器的那些人。这样看来，西方军事理论家担心在持久战争中后方不可靠是不无根据的。

苏联的军事专家们则认为，把人同技术兵器对立起来，就象推崇某一种类型的军队而贬低另一种类型的军队一样，都是不讲科学地忽视了战争的客观规律。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苏联军事专家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况且，富勒、利德尔·哈特以及德国将军谢克特的理论也没有被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所采纳。

例如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主张是打阵地战，特别是依赖于永久性的筑垒工事，依赖于马奇诺防线。这种主张大大阻碍了新兵种的发展，致使法国过低估计了进攻兵器，特别是坦克的作用。

而在英国和美国却把海军奉若至宝。他们认为，海军能够充分保障这些国家海疆的安全。

在一味寻求报复的德国，还在20年代就已形成了所谓整体战争的思想。

据我们的战役学专家们说，“Totalis（整体）这个词有准确的含义，古代的人已经能用简单的词来表达他们的意思。这个词按拉丁语的原意是‘包罗万象’的意思。也就是说，人民的经济和全部生活通通要隶属于军国主义体系，要服从于统治集团的侵略目的。在研究军事历史方面有些名气

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①阁下就是这样想的。……

在希特勒一伙掌权以后，德国最终采纳了整体战争和“闪击战”的军事理论。这种军事理论完全符合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精神：不但要消灭敌方的军队，而且要消灭其和平居民。背信弃义则是他们的行动准则。

因此，首先强调的是突然袭击，一个一个地歼灭敌人，为迅速消灭敌人要使用所有的兵力和兵器，而主要依靠的力量则是坦克和飞机。显然，“闪击战”理论对其它兵种是估计不足的。

后来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我们进一步证明德国法西斯的军事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他们重视某个兵种而轻视另一个兵种更是没有根据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军事理论家提出的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才能取胜的理论是十分正确的。

我们看得出，只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军事观点，都被一个统一的政治基础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为了侵略的目的，为了奴役其他的民族。然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理论来说，这样的基础至今仍然没有改变。……

苏联军事科学的发展完全是由另外一种社会政治基础决定的，这种基础是制定苏联军事理论的依据。苏联军事学说的可靠基础则是一个完整而深邃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对列宁所揭示的武装斗争规律性的认识过程中形成的。

首先应考虑到，苏维埃国家将被迫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联

①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德陆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德军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是德帝国主义思想家，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之一。——译注。

盟进行斗争，而且敌人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为抗击敌人的进犯，苏维埃国家必须动员其全部的人力和物力。为了夺取胜利，不仅需要数量很多的技术兵器，而且需要有数量上优于敌人的技术兵器。为此就必须挖掘国家的经济潜力。

苏联军事科学早在30年代就已制定了实施深远进攻战役的原则。根据这样的理论，为在进攻中取得胜利，需要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防御的全纵深，在选定的方向上突破敌人防御的战术地幅，迅速以快速部队（坦克、摩托化步兵和骑兵）进入交战和使用空降兵等方法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防御理论问题也在探讨之列。苏联的军事学说区别于法国阵地战观点的地方在于，把防御看成是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是为转入进攻做好准备。防御可能是战术规模的，也可能是战役规模的，可能是阵地防御或运动防御，也可能是机动防御。

这一整套的进攻和防御理论，对于苏联在1941至1945年各次交战中所取得的军事成就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军事科学发展中也有显著的失误。但在我国军民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这样的强敌的过程中，这些失误对苏联军事学术所发挥的威力，并没有多大影响。

现在我们还回到1940年，接下去谈谈当时我开始在北高加索当步兵团团长的情况……

※ ※ ※

我同过去当过骑兵的师长И·В·扎哈列维奇上校在一起工作期间，彼此的关系是冷淡的。凭良心说，我对首长没有什么不尊重的地方。不过，军队里常有跟首长观点不一致

的情况。当然，这是不应当影响到纪律的……

扎哈列维奇上校发现，我也象其他指挥员一样，头脑里有许多的“谬论”。尤其是，我们在评价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的时候，意见是分歧的。

他常说，骑兵在内战时起了卓越的作用，而在同白匪和外国武装干涉者斗争时，骑兵曾是红军的突击力量。这一点他说得对。他坚持地说：

“不论你用一辆什么样子的车子，我都不会换给你一匹活生生的马！即使换成了车子，没有我们红骑兵用鲜血换来的战术和作战方法，你也是毫无办法。”

“请允许我说说不同的看法，师长同志。我们不反对把骑兵的战术和战役法用于新型的快速部队。只是说您不大关心新的快速部队。什么富勒、杜黑啦……”

还是隶属关系发生了效力。一天，我终于受到了警告……

在我们团参加了一些例行的演习并取得好成绩以后，我被И·С·科涅夫将军调到他那新建的第19集团军的司令部当作战处副处长。毫不隐瞒地说，当时我十分高兴。

当然，师长扎哈列维奇也感到高兴，因为我这个对未来战争的看法固持己见的人离开了他。

“将军给你安排的这个位置挺不错嘛，”师长给我送别时，针对我的情绪带点嘲讽的意味说。“到那里你可以尽情地想去想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大司令部可有的是闲功夫。在我们这里你总是喋喋不休地讲什么战争呀，战争的……到大司令部可有仗打了。”

这时，我们的许多兵团从内地向西开去。为使军队更接近边境，在边境地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变更部署。

我也象集团军司令部的其他参谋人员一样，不止一次地下部队。不仅是司令部，就是部队的指挥员也在小 声 地 议 论，说我们的西部边境有情况。

因此，当我在 6 月中旬听到一个师政治部的宣讲员的说法，也就不感到奇怪了。他对军官们讲到国际形势时说：

“如果世界大战的范围扩大，我们的头号敌人就是德国。”

对于这位年轻的政工人员所说的话，我倒不觉惊奇，因为对抗击来自法西斯德国的可能侵略，党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同时也采取措施，不让希特勒一伙找到侵略的借口。这位宣讲员的直率倒使我有些震惊，因为他竟然大声说出这些当时还不让说的话。

因此我很想知道这人的姓名。

“他是资深的政治指导员斯吉尔多·米特罗番·帕夫洛维奇。”人们回答我说。

过了几天，我陪同集团军副司令员 M·A·莱特尔将军去基辅军区司令部。我们到基辅有些晚了。我们晚间就住在招待所里。这位将军是个棋迷，我无意中透露出我也爱下棋。于是我们就拼命下棋，来回走那六十四个格子，一直下到夜里两点。

“得啦，这也太不象话了，”莱特尔将军用假装不满的声调说，“我也跟你学会了，学着说：‘将’呀‘将’的，”他嘟哝着说。“睡觉吧……”

这一夜没有睡着。军区首长和司令部头天晚上就开始向西移动了，向边境移动。为什么？我久久地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吸着烟……这南方的星夜出奇的美好，真是万籁俱寂。只是在一些晚归的情侣的漫步中，姑娘的皮鞋偶尔发出

！ 嗒嗒声……

我看了看表，是夜里两点半：这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2时30分。

由于困倦，我终于支持不住了。突然，招待所里象是出了什么乱子。上下楼梯的脚步声，开门关门的啪啪声，大声的喧叫，乱作一团。我来到走廊，人们在我身边跑来跑去。

“同志，出了什么事？”

“战争！！！”

战争……我真不敢相信，但不相信是不行的。

是的，这可全完了。战争已越出政论家争辩的范围，也不再是军事学术理论家们论战的事情，而是变成了现实，就在眼前的、粗暴的现实。

说它就在眼前，是说破坏就要出现在基辅街头，就要出现孤儿……。

这座城市象是一个炸了窝的蜂箱，谣言四起，有的是关于德国派遣的破坏分子的，有的是关于乔装打扮的敌人间谍的……我立即随莱特尔将军回到第19集团军，第二天我又得出发去卢勃内城。随我后边来的是集团军副参谋长П·Н·卢萨科夫上校。在等他来的时候，我出去走走，了解一下卢勃内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我信步走到远郊，眼前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我围着它走了一圈。噢！原来是一座小医院……它座落在万绿丛中，是一个幽美的去处。

我发现，我在窗前过的时候，窗子的窗帘拉开了。我想，一定是打搅了病人，应当走开。于是，我便往返回的方向走。

不对，我感到背后有人走动，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帮妇女，有的穿医院的白长衫，有的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她们

发现我转过身来，立刻就藏到树后去了。我再向前走几步，她们又跟上来了。这时，一个系着少先队领巾的男孩从我身边过去，用好奇和敌视的眼光瞅了我一眼，就跑到前面去了。两三分钟以后，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人，领着一名警察。

警察向我走来，一只手放在手枪套上：

“干嘛在这里蹓跹呀？”

“怎么，这是禁区吗？”

“公民，您想知道的未免太多了。”

“那您要我怎么做呢？”

“这儿不准散步，这里就要成为军医院了。”

这也算秘密工作者！这时有个女人在我背后发出了警告：

“民警同志，您怎么能把这告诉他呢？”

我转过身来，好家伙，妇女们从四周围拢过来。从她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她们对我是没什么好感的。我这个男子汉也不能在妇女们面前屈服！当民警问道：“您是干什么的？”我不耐烦地说：

“难道您没看见，我是红军的指挥员”。

但这雄赳赳的民警也不示弱。

“公民证！”

我这军人哪儿来的公民证呢？他这是要干什么……

“我可没有什么公民证。您……”

他们没有让我接着说下去。

“您干嘛对他这样客气呀，民警同志！”

“不用给他留面子！”

“还心疼他呀……”

妇女们把我围得紧紧的，民警被挤到了一边。叫喊，恐吓。最后有人喊道：

“特务，准是个特务！我们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喂，娘儿们，上啊！”

这一鼓动性的号召的话音刚落，她们就开始扯我的衣服，拉下了我的图囊。“上帝保佑，总算没发现手枪。”我心想，“她们真会把我枪毙的！”

她们无情地打我，我脸上淌着血，上衣的领子也被扯破了，还有人抓着我的头发。

正象米哈依尔·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书中说的，妇女们比我还会打人，我不打算跟她们争高低，只是想说，要不是这时候赶来几个军人，我也许在这战争刚刚开始就这样不光彩地“报销”了。

这群人给军人们让出一条路。当妇女们看到军人们把身份证还给我，还给我敬了礼，她们就象一阵风一样散去了。

我还记得，当我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狼狈不堪地去见卢萨科夫上校的时候，他曾经多么惊讶地看着我；而当我告诉他，我差一点成了这小医院的卫生员和休养员手下的牺牲品的时候，他又是怎样地哈哈大笑。

“怎么，少校，祝贺你受到了第一次的战斗洗礼，”卢萨科夫一边擦着笑出来的眼泪一边说，“你用不着生这些妇女们的气，她们也是出于爱国热忱嘛……”

现在我回想起当时那种“战斗洗礼”的情景还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可当时我没有能够立即认识到那些折磨我的人的爱国主义。如果是现在我再遇到她们，一定会发自内心地对她们鞠躬施礼，把一切美好的语言献给她们……

那天我躺在床上，一夜没有阖眼，抚摸着身上的伤痕和疮

窘，痛苦地思索着我所陷入的这场闹剧的每一个细节。“她们这是把谁当成特务了！”我自思自叹，想起了我的过去……

……我出生在亚美尼亚的一座小小的山村里，这村叫恰尔达赫雷，它座落在阿塞拜疆的沙姆霍尔区的高高的山腰上。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祖国”这个词。

很早很早以前，我还小的时候，大人派我到山区的夏季牧场去找牧羊人麦赫提，当他的助手，我总觉得是很大的荣幸。人们都把麦赫提叫麦赫提大叔，直到现在我们家乡一带还这样尊敬地称呼他。当年他虽然比我要大得多，但毕竟也还是个年轻人。他常戴一顶高筒尖顶的羊皮帽，披一件肥大的黑色毡斗篷，手里拄着长长的拐仗，还拿着梢上带钩的牧羊鞭。牧羊人麦赫提在我的眼里是一位长者，他很有智慧，是我的师傅，是最高权威。他也有一套教育方法，当然不是什么现代的教育法，而主要是多方面使用他那牧羊杖：用于抓回迷途的羊羔（他为此在牧羊鞭上精心地安了一个小钩），也用于开导不懂事的小助手。

一天，我和他，还有另外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在山上爬来爬去，寻找一只走失的山羊。那小孩偷偷地哭了，我打了他后脑勺一下。麦赫提用牧羊杖狠狠揍了我后背一下，这一杖打得我至今难忘。这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可是男子汉，”就不吭声了。

牧羊人麦赫提一般很少同我们说话，特别是跟我话更少，尽管我说一口流利的亚美尼亚语，我也很会说阿塞拜疆话。我们的邻村是阿塞拜疆的阿依普卢，相离不远是个俄罗斯村庄，叫斯拉伏扬卡。从山上的牧场，居高临下望去，这些村庄似乎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在山上碰到了另一个牧羊人，他是我的亲叔叔阿依卡兹。